

未免有点伤感，何以见得呢？比如那班老先生对于现代的文学，并不去研究他实际是怎样，他所以能够成立的理由何在，好处在那里，坏处在那里，无论何事物，决没有生来美满无缺的，全靠人们去虚心研究，设法改进，才能逐渐达到圆满和完善的地位，只知摇头晃脑，积忿填胸似地骂着说：“新文学一兴，国家一定会沦亡了。”唉，这样的话，同对于一种并未尝过的果品，其实味的酸甜尚不明知，就来批评他怎么不好，怎么无味，岂不是一样无聊，一样地荒谬吗？况且我们的国家，不单是文学，文学不过是中国固有学问中的一门，并不是可以代表学问的全体。至于白话文，从前早有人用他著书了，如现在被认为第一流文学的红楼梦、水浒、儒林外史……都是用白话文著的，朱熹语录、王阳明传习录、陆世仪思辨录也都是语体的，不过在那个时候，没有新文学的名称罢了。那班老先生的天性，是和“新”字做仇敌的，只要眼睛里看见一点儿新影，耳朵里听到一点儿新声，他就不问是非，要一跳千丈的乱骂了。所以我说他们是守旧派。但是新学家提倡文学革命，纯是从应用方面着想，就是所谓实用主义的实施，何以见得呢？照我的意思说，我国的文字原可分为两种，实用的及美术的杂志、报章和教科书上的文字，属于前者，经、史、子、集、古诗、文、词等属于后者。前者是现代的，后者是先代的。我们既做了现代人，那么说话当然要用现代语言，写作也要用现代文字，况且文学不过是学问中的一部分，若是把我们的宝贵精神，都消磨到那美术的古诗文词上面去，未免有点划不上算。因为其余的学问，也都是充足常识的要素，都应该去研究的，所以白话文就应该应运而起，肩负着灌输科学常识的责任，一面又节省人们的光阴，去做别的实用学问。至于那个旧文学，也不能说毫无用处，不过是不合时宜罢了。

汪镛三 1923年9月5日

(原载《泊声报》)

烈士遗书

〔民国〕张 笠

秀妹：

永别了，我已被判处死刑，马上就要执行。我死后，望母亲不要伤心，叫笏弟好好读书，不过要到外面去读，不要在家里读死书，同时要读熟我这一封信。你要为我带大刚出世八天的孩子。你要告诉孩子，说明我的死因并不是什么强盗土匪，是县党部那些委员，尤其是蔡嘉厚，将公报私。因我这次在南昌乐平同乡会开会我提议过要清算县党部的帐。听说你因产小孩已找保出狱，这个你要当心。朱鹤家里请周晋丰（即周树人家里）等铺子做三个公禀到县政府，蔡嘉厚马上就派人将周树人的父亲押起来，一直等周老板等否认他的公禀才放出来。你看情形吧，如有机会，你还是带着孩子逃吧，家中也管不了，也无法去管。杨营长真好，他拍胸负责将这封信亲自交给母亲，如果你真能看到这封信，你要带着孩子每天焚香替杨营长祝福，县党部蔡嘉厚告我的公事我都看见了，他说我是方志敏派来的，住在徐郁璘家里，每天深夜召集一班匪徒开会，准备接应磨盘山方志敏进城抢劫徐跃出狱，要县政府立刻将我们逮捕就地枪决。在县政府同耶稣堂反复审问了三日三夜，受尽了痛苦，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刑罚我都尝过了。秀妹，说话时间没有了，不能写了，你不要哭，你记着下面数句话：

1. 我的兄弟子侄都要将信给他看。
2. 请母亲带建华表哥同姐姐来收我的尸体。